

生活事件、思维风格对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预测效应

张晓文^{*}

[摘要] 本研究采用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量表、生活满意度量表、总体幸福感量表、思维风格调查卷、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作为工具,以304名在校大学生为被试,采用层级回归分析模型,对生活事件和思维风格对主观幸福感的预测效应进行探讨。研究发现,人际关系负性生活事件对总体幸福感指数、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有显著的预测效应。立法型思维风格、等级型思维风格和寡头型思维风格可以显著预测主观幸福感。立法型思维风格对负性生活事件预测积极情感具有调节作用,寡头型思维风格与人际关系负性生活事件的交互作用可以显著预测总体幸福感指数、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

[关键词] 生活事件;思维风格;主观幸福感;层级回归模型

一、问题的提出

幸福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 SWB)是“幸福(Happiness)”的一个操作性定义,强调个体依据自己设定的标准而不是专家或学者的看法对其生活质量做出评判(汪宏, 窦刚, 黄希庭, 2006),包括从认知和情感两个方面做出的判断。大多数学者认同Diener对主观幸福感的定义,即个体关于自己积极情感、消极情感和全面生活满意度的自我评价(Diener, 1994)。关于主观幸福感的心理机制可以分为“自下而上”(Bottom-up)和“自上而下”(Top-down)两类,分别强调外部环境和内部特质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Diener, 2000)。

强调内部特质的研究指出,思维风格或认知方式可能是影响主观幸福感水平的一个比较稳定的心理变量。积极的思维风格会缓冲负性生活事件的冲击,积极思维的水平越高,压力增加与“沮丧”之间的关系就会越弱,只是这种缓冲的影响一直只发生在交叉分析中(Lightsey, 1994)。而完美主义和过分概括化的思维风格与较不愉快相关,消极的思维与情绪低落相关,进而可以预测SWB。Brief等人的研究发现,客观的生活环境和人格特质并非直接预测SWB,而是通过对生活事件的解释。也就是说,生活事件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应该考虑解释的倾向或思维风格(Brief, Butcher & George, 1993)。

强调外部环境对幸福感影响的研究注意到生活事件对幸福感的影响。生活事件指人们在社会生活过程中经历的各种紧张性刺激。人们对“生活事件与SWB的关系”的研究还没有达成一致。有

^{*}心理学博士,南京工业大学心理健康研究中心副教授,211816。本文是江苏省教育厅哲社课题(2016SJD710033)阶段性研究成果。

学者研究认为各种生活事件都没有对大学生SWB产生明显的影响(严标宾,郑雪,邱林,2001)。也有学者研究发现,“不喜欢上学”和“与老师关系紧张”对初中生SWB具有较好的预测作用(王极盛,丁新华,2003)。Headey等人的研究指出,外部事件的总量能解释主观幸福感变异中的10—15%,生活事件对SWB的影响应该因研究对象及其研究背景的不同而异,重要的生活事件会对主观幸福感产生影响(Headey & Wearing, 1989)。快乐适应理论认为,人们可以适应任何生活环境的变化,主观幸福感伴随着对生活事件的适应过程回归到由生理因素所决定的基准水平(Frederick & Loewenstein, 1999)。Heller等人指出,重大的危及生命的事件是通过激活逃避动机来降低个体的主观幸福感水平的(Heller, Seger-Guttman & Van Dijk, 2013)。

本研究以大学生作为研究对象,采用层级回归分析技术,考察生活事件、思维风格对大学生主观幸福感预测效应,以及思维风格与生活事件在预测主观幸福感时的交互作用。

二、研究方法

(一) 被试

综合性大学在校大学生320人参与研究,16人因遗漏题目被剔除,304人测验结果有效,有效率为95%。304名被试包括大一156人(51.3%),大二83人(27.3%),大三40人(13.2%),大四25人(8.2%),年龄范围在17—24岁,平均20.3岁。男生207人(68.1%),女生97人(31.9%);文科学生71人(23.4%),理工科学生233人(76.6%);来自农村162人(54.5%),来自城市135人(45.5%);独生子女198人(67.1%),非独生子女97人(32.9%)。

(二) 测验工具

1. 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采用刘贤臣等人设计的《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ASLEC)。该量表的Cronbach α 信度系数0.89,奇偶分半信度系数0.913,间隔一周的平均重测信度为0.496,总刺激量重测相关系数为0.686。该量表包括六个分量表,分别是人际关系、学习压力、受处罚事件、重大丧失、健康与适应和其他因子。统计指标有两个,事件发生频度和刺激量。

2. 思维风格量表,采用斯滕伯格和马丁等人编制的《思维风格调查问卷》(Sternberg, 1997)。斯滕伯格认为思维风格是个体偏好的思维方式,人们拥有的不是一个风格,而是一个风格的图谱。对思维风格的命名,斯滕伯格将之与政府的组织管理进行类比。在智力功能上存在三种类型的思维风格,分别是立法型(Legislative Style, LeS)、行政型(Executive Style, ES)和司法型(Judicial Style, JS);在思维形式上有四种风格类型,即君主型(Monarchic Style, MS)、等级型(Hierarchical Style, HS)、寡头型(Oligarchic Style, OS)和无政府型(Anarchic Style, AS);在水平维度上有两种风格类型,即全局型(Global Style, GS)和局部型(Local Style, LoS);在范围维度上有内倾型(Internal Style, IS)和外倾型(External Style, ES);同时还有两种思维倾向,自由型(Liberal Style, LiS)和保守型(Conservative Style, CS)。《思维风格调查问卷》系自陈量表,经中英文互译进行修订,由104道题目组成,分别属于13种思维风格。量表采取7点计分,由被试在一个七点量表上评价每一句陈述符合自己实际情况的程度。该量表在我国大学生中使用,各分量表的信度在0.42—0.86之间,总的信度系数为0.85。该量表具有较好的构想效度(武欣,张厚粲,1999)。

3. 主观幸福感量表,本研究测量主观幸福感分别采用Campbell等人设计的《幸福感指数量表》(IWB)、Watson等人设计的《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量表》(PANAS)和Mandak与Yuen修订的《生活满意度量表》(LSS)。《幸福感指数量表》(IWB)包括总体情感指数量表和生活满意度问卷,前者由8个项目组成,后者仅有一项,7点计分,以总体情感指数量表之均分与生活满意度得分(权重为1.1)相

加计算总分,为幸福感指数。该量表具有较好的一致性信度与效标关联效度。《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量表》和《生活满意度量表》是根据Diener的建议,分别测量主观幸福感的三个构成要素,即积极情感、消极情感和生活满意度。《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量表》(PANAS)包括20个描述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的词汇,要求被试在一个五点量表上打分,评价自己总体的情感状态。量表经过中英文互译进行修订,在大学生中进行测试,各积极情感的信度系数在0.78—0.85之间,消极情感的信度系数在0.76—0.84之间。《生活满意度量表》包括五个关于生活满意度陈述,5点计分。在大学生中进行测试,Cronbach α 系数为0.84,重测信度为0.78。

(三) 测验过程

被试系选修心理学课程的学生,自愿参加测试。测验在选修课结束后进行,被试被邀请参加一项有关幸福感的调查研究。测验不记名,测验结果与课程成绩无关。对需要反馈结果的被试,在研究结束通过预留电话个别进行。测验分三次进行,分别进行生活事件、思维风格和主观幸福感的测验,一个星期内完成。被试在第一次测试时获得一个随机的编码,后面两次测验采用同样的编码以确保数据与被试的一一对映。测验不限时间,大部分被试每次测试的时间不超过20分钟。数据分析通过Spss16.0完成。

三、研究结果

(一)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本研究中的数据均来自被试对自陈量表的反馈,这种方法可能会产生共同方法偏差(杜建政,赵国祥,刘金平,2005)。为此,本研究首先在测评程序上通过匿名和分离预测源和效标变量的测量的方法来减少这种系统误差。对共同方法偏差的检验采用Harman单因素检验法,将所有变量的测量项目放在一起进行未旋转的因素分析。该方法假设如果只析出一个因素或第一个因素解释了绝大部分变异,即可判定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反之则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周浩,龙立荣,2004)。本研究按此方法进行操作,结果显示第一个主成分解释的变异为17.68%,未占到总变异解释量(68.29%)的一半。由此可见,共同方法偏差在本研究中应不会造成严重的影响。

(二) 生活事件、思维风格与主观幸福感的相关分析

方差分析的结果显示,来自城市或农村、年级、文理科、是否独生子女、是否贷款缴学费等人口学因素对主观幸福感没有显著的影响。

在本研究中,主观幸福感的4个指标作为因变量,即总体幸福感指数、积极情感、消极情感和生活满意度。生活事件的6个分量表的频度和刺激量、思维风格的13个分量表作为最初的预测变量。研究的第一步是通过相关分析和预回归分析,确定回归模型的自变量。生活事件与主观幸福感的相关分析结果显示,生活事件的频度与积极情感、消极情感显著相关($r=-0.12, p<0.05$; $r=0.11, p<0.05$),生活事件的总量与消极情感显著相关($r=0.12, p<0.05$)。人际关系生活事件与积极情感、消极情感和总体幸福感指数显著相关。分别以总体幸福感指数、积极情感、消极情感和生活满意度作为因变量,以生活事件的频度、负性事件总量、人际关系生活事件作为预测变量,进行标准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人际关系生活事件可以显著预测总体幸福感指数($F(1, 303)=7.97, p<0.01$)、积极情感($F(1, 303)=78.59, p<0.01$)和消极情感($F(1, 303)=13.18, p<0.01$)。生活事件的频度和总体刺激量的预测系数没有达到显著性水平。13种思维风格与主观幸福感的相关分析显示,立法型思维风格、等级型思维风格和寡头型思维风格与总体幸福感指数、积极情感、消极情感和生活满意度显著相关,司法型思维风格与积极

情感显著相关 ($r=0.14, p<0.05$), 内倾型思维风格与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显著相关 ($r=-0.14, p<0.05$; $r=-0.14, p<0.05$), 其他 8 种思维风格与主观幸福感各因子的相关不显著。分别以总体幸福感指数、积极情感、消极情感和生活满意度作为因变量, 以相关显著的 5 种思维风格作为预测变量, 进行标准回归分析, 结果显示立法型思维风格、等级型思维风格、寡头型思维风格可以显著预测总体幸福感指数、积极情感、消极情感和生活满意度。司法型思维风格对积极情感的预测系数没有达到显著性水平, 内倾型思维风格对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的预测系数不显著。

由此确定本研究中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基本预测因子, 分别是人际关系生活事件、立法型思维风格、等级型思维风格和寡头型思维风格。这些因素与主观幸福感各指标的均值、标准差及其相关系数见表 1。

表 1 相关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及相关系数

	1	2	3	4	5	6	7	8
1. 总体幸福感指数								
2. 积极情感	.559**							
3. 消极情感	-.535**	-.622**						
4. 生活满意度	.872**	.139*	-.116*					
5. 人际生活事件	-.160**	-.166**	.204**	-0.074				
6. LeS	.341**	.274**	-.262**	.242**	-.357**			
7. HS	.339**	.305**	-.182**	.255**	-.238**	.607**		
8. OS	-.274**	-.208**	.270**	-.179**	.262**	-.469**	-.389**	
N	304	304	304	304	304	304	304	304
Mean	9.51	3.56	2.25	4.17	8.46	5.27	4.63	3.68
STD	1.88	0.76	0.72	1.37	2.9	1.12	0.97	0.94

* $p<0.05$; ** $p<0.01$

(三) 生活事件、思维风格对主观幸福感的预测效应

生活事件中的人际关系负性生活事件单独对主观幸福感的总体幸福感指数、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的预测效应显著, 预测效果是一致的, 即人际关系负性事件越严重, 幸福感指数越低, 负性情感越多, 而积极情感越少。在此基础上, 运用层级回归分析模型, 分别以主观幸福感的总体幸福感指数、积极情感、消极情感为因变量, 进行九个系列的层级回归分析。每个系列中, 在确定因变量的基础上, 第一步, 生活事件进入方程; 第二步, 思维风格进入方程; 第三步, 生活事件和思维风格的乘积项进入方程。根据Baron和Dawn等人的观点, 如果每一步的模型变化 s 达到显著性水平, 即说明思维风格对生活事件预测主观幸福感的调节作用显著 (Dawn, 2001)。分别以总体幸福感指数、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为因变量的层级回归分析的结果见表 2。

表 2 层级回归分析结果及模型检验

	总体幸福感指数				积极情感				消极情感			
	β	R^2	ΔR^2	F	β	R^2	ΔR^2	F	β	R^2	ΔR^2	F
第一步: 生活事件	-0.15	0.03	0.03	7.97**	-0.24	0.03	0.03	8.59**	-0.34	0.04	0.04	13.18**
第二步: 立法型思维风格	0.45**	0.12	0.09	31.45**	0.23	0.1	0.07	17.18**	-0.07	0.08	0.04	13.43**
第三步: 生活事件*立法风格	-0.19	0.12	0.002	0.72	0.16	0.11	0.01	12.51**	-0.21	0.08	0.002	0.779
第一步: 生活事件	-0.27	0.03	0.03	7.97**	-0.03	0.03	0.03	8.59**	-0.02	0.04	0.04	13.18**
第二步: 等级型思维风格	0.54**	0.12	0.09	32.96**	0.33**	0.1	0.07	25.09**	-0.23	0.06	0.02	6.02*
第三步: 生活事件*等级风格	-0.38	0.13	0.01	1.87	-0.08	0.1	0.002	0.07	0.16	0.06	0.002	0.31

	总体幸福感指数				积极情感				消极情感			
	β	R^2	ΔR^2	F	β	R^2	ΔR^2	F	β	R^2	ΔR^2	F
第一步:生活事件	-0.76**	0.03	0.03	7.97**	-0.61**	0.03	0.03	8.59**	0.93**	0.04	0.04	13.17**
第二步:寡头型思维风格	-0.65**	0.08	0.05	19.02**	-0.47**	0.06	0.03	9.28**	0.7**	0.09	0.05	15.28**
第三步:生活事件*寡头风格	0.89**	0.13	0.05	16.72**	0.65**	0.08	0.02	8.51**	-1.03**	0.16	0.07	18.83**

** $p<0.01$; * $p<0.05$ 。

由表2可见,在控制生活事件的情况下,立法型思维风格依然可以显著预测总体幸福感指数、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立法型思维风格与生活事件可以解释总体幸福感指数变异的12%,积极情感变异的7%,消极情感的8%, R^2 和F值的变化都达到显著性水平。增加负性事件与立法型思维风格的交互作用项以后,以积极情感为因变量的模型变化显著, $F(1,301)=12.51, p<0.01$ 。以总体幸福感指数和消极情感为因变量的模型变化没有达到显著性水平。等级型认知风格在控制生活事件以后,依然可以显著预测总体幸福感指数、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在增加生活事件与等级型认知风格的交互作用以后,模型的变化均不显著。寡头型思维风格在控制生活事件的影响以后,依然可以显著预测总体幸福感指数、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增加寡头型思维风格与生活事件的交互作用项以后,模型的变化显著, $F(1,301)=16.67, p<0.01$; $F(1,301)=8.51, p<0.01$; $F(1,301)=18.83, p<0.01$ 。生活事件、寡头型思维风格及其交互作用一起可以解释总体幸福感指数变异的13%,积极情感变异的8%,消极情感变异的16%,寡头型思维风格的调节作用显著。

(四) 思维风格对生活事件预测主观幸福感的调节效应

在回归分析的基础上,根据生活事件对主观幸福感的预测值,我们绘制了思维风格高分组和低分组(根据 $M \pm 1SD$ 划分)回归趋势图,以考察思维风格在负性生活事件预测主观幸福感上的调节效应,结果见图1-图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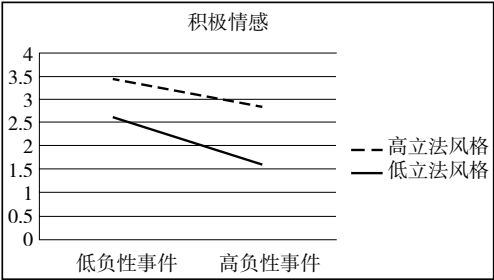


图1 立法型思维风格对生活事件预测积极情感的调节效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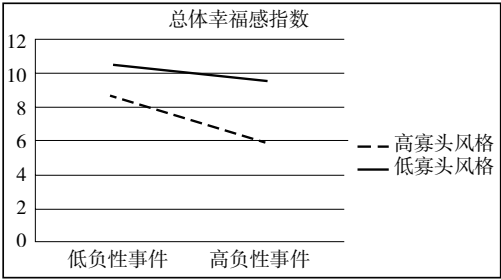


图2 寡头型思维风格对负性生活事件预测总体幸福感的调节效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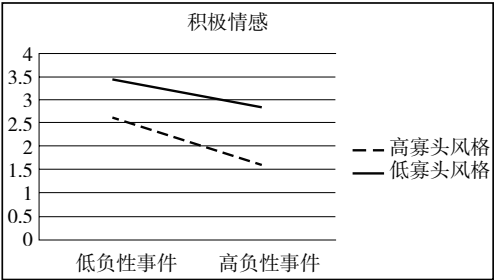


图3 寡头型思维风格对负性生活事件预测积极情感的调节效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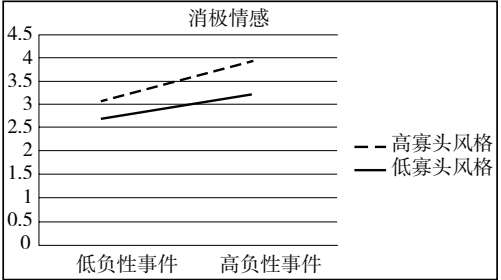


图4 寡头型思维风格对负性生活事件预测消极情感的调节效应

数据显示,高立法风格的人积极情感的水平要高于低立法风格的人,同时立法型思维风格缓冲了负性生活事件对主观幸福感的预测效应,随着负性生活事件的增加,其积极情感下降的速率逐渐减缓。高寡头风格的大学生比低寡头风格的大学生总体的主观幸福感要低,较少的积极情感和较多的消极情感。同时,随着负性生活事件的增加,其总体幸福感、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的改变速率明显发生变化,意味着寡头型思维风格对负性生活事件影响主观幸福感的调节作用明显。

四、讨论

(一) 生活事件对主观幸福感的预测效应

从直觉上,负性生活事件似乎会降低主观幸福感的水平,但很多生活事件与主观幸福感的相关研究显示,生活事件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相关很低,经济收入、年龄、健康状况等只能解释极少部分的主观幸福感的变异。有人提出“快乐适应”来解释这一现象,“快乐适应”是指伴随生活环境的转换,个体回归快乐基线水平的过程(Lucas, 2007)。这种适应过程保护个体免受重大事件所造成的持久的身心伤害,确保环境新的改变得到特别的关注,从而可以积极有效应对。根据快乐适应理论,重要生活事件发生之初,人的主观幸福感会受到影响,但随后就发生适应过程,直至恢复到基线水平。

在本研究中,生活事件中只有人际关系负性事件与总体的幸福感指数、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呈显著低相关($r=-0.16, p<0.01$; $r=-0.17, p<0.01$; $r=0.20, p<0.01$),负性生活事件的频度与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显著相关,负性生活事件的总量与负性情感相关显著,其他都没有达到显著性水平。所有的负性生活事件的统计指标与生活满意度都没有达到显著性相关。回归分析的结果显示,人际关系负性生活事件可以解释主观幸福感变异的3%—4%。负性生活事件尤其是人际关系负性生活事件可以显著预测大学生主观幸福感中的情感因素,但对生活满意度的预测效应不显著,这是适应的结果。适应是存在的,这种适应使负性生活事件对个体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得到缓冲,个体也在负性生活事件的经历中获得成长。但是适应的过程是复杂的,是个体与环境互动的结果,个体的先天素质、发展阶段、社会支持系统以及生活事件的严重程度等都会影响到适应的结果(Chih-Che Lin, 2016)。另外,本研究的相关系数可能低估了生活事件与主观幸福感的相关性,这种低估可能与研究方法有关。Locus 等人采用大型面板技术考察重大生活事件后的适应情况,包括婚姻变故、失业、残疾等,结果发现,适应不是必然的,而且存在明显的个体差异,约有三分之一的人在发生重要生活事件后生活满意度有持久的改变。而且个体生活事件发生前后的变化与是否发生某个事件的人之间的差异是不同的(Richard, 2007)。

(二) 思维风格对主观幸福感的预测效应

本研究证实,思维风格可以显著预测个体的主观幸福感,在控制负性生活事件的前提下,立法型和等级型思维风格与总体的幸福感指数显著正相关($r=0.34, p<0.01$; $r=0.34, p<0.01$),寡头型思维风格与总体幸福感指数呈显著负相关($r=-0.27, p<0.01$),它们分别可以解释总体幸福感指数的5%—9%。在斯滕伯格看来,思维风格是人类使用智能的方式。立法型思维风格是一种独立的、自主的、创造性的思维方式。具有这种风格的人喜欢自己决定做什么和如何去做,喜欢创建规则,喜欢那些允许自己建构的、创造性的问题,而不是事先设定好的问题。立法型思维风格的大学生主观幸福感更高,可能与这种风格“自定规则”的特点有关,为人处世较不受他人影响,也可能与大学教育鼓励独立思维有关。在基础教育阶段,为了高考,学校比较鼓励循规蹈矩的学生,立法型思维风格的学生比较受束缚,一旦进入大学,在鼓励独立、自主、创造的氛围中,他们的幸福感就得

到提高。

等级型思维风格体现在面对多个目标时解决问题的方式上。具有这种风格的人认识到不是所有的目标总是都能得到满足,甚至也不能平均地被满足,需要设置目标实现的优先级。这种人比较容易接受问题的复杂性,认识到需要从多个角度看问题,以便正确设置问题解决的优先权。等级型思维风格的大学生主观幸福感较高可能与其对复杂问题的“掌控”能力有关。

寡头型思维风格的人希望在同一时间框架做多个事情。但与等级型风格不同的是,寡头风格的人倾向于被几个经常相互冲突的、被感知为同样重要的目标驱动。他们在面对时间或其他资源方面有竞争的要求时会感觉有压力。他们并不总是确定先做什么,或为每个需要完成的任务分配多少时间。寡头型思维风格的大学生主观幸福感较低,可能因为这种思维风格常常陷入“难以取舍”的窘境。

(三) 思维风格的调节作用

在本研究中,思维风格的调节作用体现在立法型思维风格和寡头型思维风格与生活事件的交互作用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立法型思维风格与生活事件交互作用,减缓了积极情感随负性生活事件增加而降低的幅度。这意味着,面临负性生活事件时,立法型的思维方式可以减缓负性生活事件对主观幸福感的负面影响。在遭遇被误解、被歧视、与朋友和家人之间人际冲突时,立法型的人独立的、不受他人影响的、坚持自己想法和做法的解决方式,使自己惯有的好的感觉免受影响。

寡头型思维风格的调节作用与立法型思维风格不同,它强化了负性生活事件对主观幸福感的负面影响,具体来说,经历负性生活事件,寡头型思维风格的人积极情感水平降幅增大,而负性情感的增幅提高,整体的幸福感水平迅速下降。寡头型思维风格的人习惯认为所有的事情都很重要,都要处理,不分主次,不分先后,常常让事情变得更加糟糕,从而强化了负性事件对主观幸福感的负面影响。

五、结论

本研究主要考察了思维风格和生活事件对主观幸福感的预测效应。结果显示,人际关系的负性生活事件对主观幸福感有预测作用,模型拟合良好,可以解释主观幸福感总体变异的3%-4%。立法型思维风格、等级型思维风格可以单独正向预测主观幸福感,寡头型思维风格可以单独负向预测主观幸福感,模型拟合良好。思维风格可以解释主观幸福感总体变异的5%-9%。立法型思维风格是负性生活事件影响积极情感的调节变量,可以减缓负性事件导致的积极情感水平的下降。寡头型思维风格对负性生活事件影响主观幸福感的调节作用显著,强化了负性事件对主观幸福感的负面影响。

参考文献:

- 严标宾、郑雪、邱林, 2001:《广州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研究》,《心理学探新》第4期。
- 汪宏、窦刚、黄希庭, 2006:《大学生自我价值感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研究》,《心理科学》第3期。
- 吴明霞, 2000:《30年来西方关于主观幸福感的理论发展》,《心理学动态》第4期。
- 王极盛、丁新华, 2003:《初中生主观幸福感与应对方式的关系研究》,《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第11期。
- 温忠麟、侯杰泰、张雷, 2005:《调节效应与中介效应的比较和应用》,《心理学报》, 2005, 37(2)。
- 周浩、龙立荣, 2004:《共同方法偏差的统计检验与控制方法》,《心理科学进展》第6期。
- Baron, R. M. & D. A. Kenny, 1986, "The Moderator-Mediator Variable Distinction in Social Psychological Research: Conceptual, Strategic, and Statistical Considerations",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vol.51, pp. 1173—1182.

- Brief, A. P., A. H. Butcher, J. M. George & K. E. Link, 1993, "Integrating bottom-up and top-down theories of subjective well-being: The case of health",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vol.64, pp. 646—653.
- Diener, E., R. A. Emmons, R. J. Larsen & S. Griffin, 1985, "The Satisfaction with Life Scal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ssessment*, vol.49, pp. 71—75.
- Diener, E., 1994, "Assessing subjective well-being: Progress and opportunities",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vol.31, pp. 103—157.
- Diener, E., 2000, "The science of happiness and a proposal for a national index", *American Psychologist*, vol.55, pp. 34—43.
- Iacobucci, D., 2001, "Special Issue on the methodological questions of the experimental behavioral researcher", *Journal of Consumer Psychology*, vol.10, pp. 83—100.
- Headey, B., A. Wearing, 1989, "Personality, life events,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Toward a dynamic equilibrium model", *Journal of Personality Social Psychology*, vol.57, pp. 739—741.
- Lightsey, O. R., Jr., 1994, "Positive automatic cognitions as moderators of negative life event dysphoria relationship", *Cognitive Therapy and Research*, vol.18, pp. 353—365.
- Lin, C., 2016, "The roles of social support and coping style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ratitude and well-being",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 vol.89, pp. 13—18.
- Sternberg, R.J. & R. Wagner, 1991, *Thinking Style Inventory*, Tallahassee, FL: Star Mountain Project.
- Sternberg, R. J., 1997, *Thinking Styl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Watson, D., L. A. Clark & A. Tellegen, 1988,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brief measures of positive and negative affect",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vol.54, pp. 1063—1070.

(责任编辑:蒋永华)

Life Events and Thinking Styles: Their Predictive Effects on Undergraduate's Subjective Well-Being

ZHANG Xiao-wen

Abstract: Subjective well-being (SWB), which is influenced by many factors, refers to the personal assessment of one's positive and negative affect as well as his general satisfaction with life. Employing Positive and Negative Affect Scale, Life Satisfaction Scale, Index of Well Being, Questionnaire of Thinking Styles, Adolescent's Life Event Scale, the present study investigated how life events and thinking styles work as predictors of SWB in a sample of 304 undergraduates by hierarchical regression analysis. It is found that negative life events in the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have a strong predicative effect on the index of well being and positive and negative affect. Legislative style, hierarchical style, and oligarchic style are found to further augment the prediction of SWB, positive affect and negative affect. In addition, the legislative style is found to buffer negative association between life events and positive affect. Oligarchic style is found to enlarge negative association between life events and SWB.

Key words: life event; thinking style; subjective well-being; hierarchical regression model